

#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

周海婴 著

作家出版社

# 直面与正视

---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 / 周海婴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212-0290-8

I. ①直…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264421号

## 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

作 者：周海婴

责任编辑：张 平

装帧设计：高高国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 出版发行部 )

86-10-65004079 ( 总编室 )

86-10-65015116 ( 邮购部 )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 作家在线 )

印 刷：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5 × 240

字 数：353千

印 张：31.5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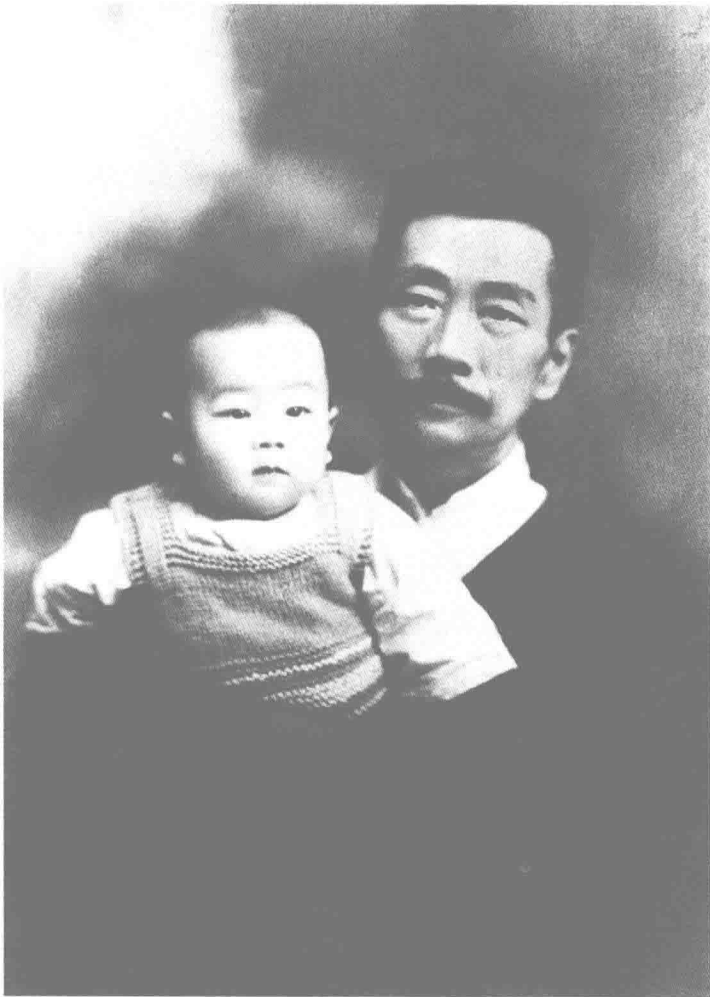
定 价：8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实事求是，直面自己的人生。



“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摄于上海

## 有些性格像鲁迅

顾明远

我认识海婴是在一九五六年。那年夏天我和周蕓结婚，周建老为我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设宴招待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到场的自然有许广平妈妈带领的一家，还有杨之华、徐伯昕夫妇以及我们在苏联留学的几位同学。海婴负责摄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和值得怀念的影像。因为他忙着摄影，我们全家福里反而没有他的照片，不能不说是有点遗憾。以后我们就有五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俩是同龄人，可惜他先我而去，使我无限悲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日，北京都要举行庆祝游行。我们早上六点多钟从北师大出发，经过西安门到北池子，在南池子一带待命，等到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后在南长街解散。那时已到中午，正是饥肠辘辘，我和周蕓就直奔景山东街广平妈妈那里蹭饭吃。广平妈妈总是热情招待我们。于是我有时就和海婴海阔天空地聊起来。

海婴绝顶聪明。据周建老回忆，海婴小时候就喜爱机械玩具，并且喜欢拆拆装装。十二三岁就开始摆弄摄影和无线电。那时他在亭子间里搞了一个小小实验室，自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到晚

年他还有注册的私人电台。我对无线电一窍不通，但年轻时也喜欢摄影，当然也只是玩玩，旅行时留个纪念，没有海婴那样精通。那时彩色照相掀起不久，我在苏联买了一套冲洗彩照的设备，程序很复杂，我试验了几次都不太成功。我觉得海婴可能会用，就把它送给了他。后来彩照的技术发展得很快，我那套设备可能也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海婴是先进技术的弄潮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常骑着漂亮的摩托车到我们家来看望他的三叔周建老，每次都会给我们摄像。我家的全家福照片都是他照的。

海婴八十岁时在北京国子监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邀请我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佩服他摄影技术之高超，更钦佩他从年青时代就关心社会。照片中不仅有社会民众的生活，还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像。他的摄影作品，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而且反映了时代的脉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海婴和三叔周建老有深厚的友谊，称呼他为三爹，平时每年都来看望他。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建老在浙江工作，海婴那时身体欠佳，就到杭州三爹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叔侄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还送给三爹一方田黄石印章。可见他们在那里曾谈文说赋，一定十分愉快。我们家一般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更是从不做寿。但一九七八年周建老九十诞辰那天，海婴却捧了一个大蛋糕来，有上下三层，说是特地到北京饭店定做的。大家当然欢乐一堂。

海婴的性格很刚毅，做事很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但实事求是，从无虚假。有时我们通电话，正事谈完，他就说，就谈到这里吧，电话就挂断了，来不及与他说闲话。但他办事十分认真，什么事都要穷追到底。所以周建老曾说：“有些性格像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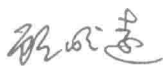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值得记一下。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建老就与许广平把北京八道湾的房产中属于他们的两份捐献给了国家。一九五八年秋天，周建老带我和周蕻去看望了鲁老太太的墓地，大约在玉渊潭附近。那时那里还是一片荒野。鲁老太太的坟被几十棵松柏树围绕，虽然没有陵寝房屋，倒也非常庄严幽静。不久听说北京市要在那里开发用地，周建老就与广平妈妈商量，给当时的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把这块墓地也捐给国家。八十年代，海婴想把鲁老太太的灵柩迁葬到绍兴。他和我去寻找那块墓地，那里已经盖起许多房子，鲁老太太的灵柩已迁到另外一处空地。房管所的同志带我们去看，但已经无法确定，商量多次，只好作罢，感到十分遗憾。

海婴晚年，曾经因为绍兴祖坟立碑的事生过气。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一世纪初，绍兴有人发现并告诉海婴，鲁迅父亲周伯宜墓前立有一块以周丰一率子女名义立的墓碑。海婴就很有意见，祖宗是大家的，怎么能以一家的名义立碑。他与堂妹周蕻商量，提出了一个方案，并在上海讨论共同签注了意见，重新在周福清墓前以“越城周氏第十五世曾孙同立”、在周伯宜墓前以“越城周氏第十五世孙同立”的名义各立了一块墓碑，这就比较全面周到，把周氏三兄弟都包括在内了。去年（二〇一七年）九月，令飞带领我们专门去绍兴扫墓，墓碑做得很气派，这都是海婴的主意。

我的夫人周蕻，可以说现在见过鲁迅的人恐怕也就只有她一个人了。鲁迅去世时她四岁，依稀还记得每周末姊妹三人轮流到鲁迅家里做客，和海婴一起玩耍。海婴在世时，我们每年总会见面聊聊家常。海婴也说：“我就只有这一个妹妹了。”因为大姊、二姊都不在了。想起这些事来，如在眼前。



海婴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文章，但一直理不出头绪来。明年是海婴诞辰九十周年，令飞将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重版，并更名为《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书名改得好，海婴这本书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实事求是，直面自己的人生。作为名人的后代，他受到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他也不为尊者讳，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纠正了社会上流传的许多误解。令飞要我为新版书作序。本来我觉得海婴此书具有研究鲁迅的重大价值，应该请鲁迅研究者写序。令飞执意要我作为海婴的亲属和朋友来写。我从命写了这些回忆以表达我对海婴的怀念之情。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 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

周令飞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凌晨五点三十六分，家父周海婴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一岁。父亲自前一年五月开始入院治疗，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与病魔进行抗争，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弘扬鲁迅文化的事业。在离世前二十多年，父亲一直在为他的父亲——鲁迅奔忙着。

很多人认为在祖父鲁迅的盛名之下，父亲海婴先生的一生承载着“不能承受之重”。父亲确实也曾说过：“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然而，父亲又说，鲁迅在给他压力的同时又一直在鞭策着他，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坚忍执着以及对社会的强烈使命感。或许父亲海婴先生的一生过于沉重了一些，但是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历练的过程，他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长，在最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整个人格。如果回顾他成长的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们在打桥牌、跳交谊舞，父亲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马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鲁迅的儿

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父亲只能选择沉默，黯然离开。父亲大学学习的是无线电，工作始终是行政管理，父亲是记住了鲁迅临终那句针对他的遗言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然而，周围人还是拿着不同的尺子来丈量他，对他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所以最初，在一个绑手绑脚的、不平等的环境中，那时候的他是想要远离的，这是父亲的第一阶段。

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让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很多个人打着集体甚至政府的旗号在侵权，其中，对鲁迅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严重。对于这些事情父亲是很看不惯的，他觉得，过去，我们把鲁迅的一切几乎都交给国家了，是为了纪念，是为了研究和宣传，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会有个别人拿鲁迅去赚钱呢？从我父亲的思维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赚钱的话，那我是继承者，你当然要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权利。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懂法，他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我是他儿子，你都不理我，就躺在别人身上去赚钱，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呀。而且父亲发现，不仅是鲁迅的权益被公然侵犯，几乎所有现代文化名人的，尤其一些左翼作家的后裔的权益也被冠冕堂皇地剥夺。他感到了必须进行维权活动的重要性。由此父亲开始了第二个成长阶段，他不再逃离祖父的光环，而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无所畏惧地站出来。耿直的他无法忍受“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

直至二〇〇〇年，父亲海婴先生已经在维护鲁迅权利的路上很辛苦地走了十几年。但他尚未彻底赢得一场官司，却已经收获

了许多白眼和骂名，比如说：鲁迅的儿子不孝；周海婴真让他的父亲丢脸，竟为了钱对簿公堂；周海婴死要钱贪得无厌，要了还想要，他还算是个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吗？父亲曾告诉我：“不仅仅是朋友，甚至一些有权力的知识界人士、领导干部也这么认为。他们也爱护鲁迅，但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对我说，鲁迅这么伟大，那么你这个鲁迅的后代，就绝对不能提权或者钱。这些都不能提。提了好像就丢了脸。甚至有一位领导来找我，很亲切地跟我说，海婴啊，你是鲁迅的儿子，你要爱惜你父亲在社会上的影响啊！”

各种不理解、责备甚至辱骂扑面而来，父亲顶着“鲁迅不孝子”的恶名以及极大的委屈坚持了下来。他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他有着科技行业人士的思维，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非得坚持。而且我父亲是不轻易下决心的，一旦认准了道路，就会一直走到底。当别人对他冷嘲热讽时，他嘴上不讲，只是淡淡的一笑，但是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当谈论某事时，他会当面锣对面鼓地把意见提出来，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够圆滑，有时还会得罪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像他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一九九九年，我正在上海，看到父亲维权辛苦，又经常被人家骂，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太为难他了，我就开始帮他。帮着帮着我们就觉得家属应该成立一个机构出面维权，来做一些事情。二〇〇二年三月我们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将父亲个人的维权活动，提升为一个机构、一种事业来开展，以机构对应机构，以集体方式开展活动，以规模化经营推进文化事业。而以后许多与鲁迅有关的活动都得以迅速启动，获得广泛支持。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促成北京、上海两个鲁迅纪念馆整理出鲁迅捐赠物品清单；维护鲁迅权益，由单纯的稿酬案、著作权官司，延伸到肖像权系列诉讼案、名人姓名权案、商标注册权案、冠名权案、网络域名抢注案等等，为这十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用著名律师朱妙春先生的话说：通过鲁迅系列法律官司，我们为当代法治建设开创了许多先河。特别是二〇〇八年三月直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从鲁迅纪念馆看健全文博工作〉的提案》《关于〈健全名人姓名注册中文域名〉的提案》，更是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

同时，在为维权奔忙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这不是我们家属认识的鲁迅。父亲开始感觉到维权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弘扬鲁迅精神，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为此，二〇〇一年父亲完成并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一次从个人的角度，讲述鲁迅作为一个父亲的具体形象和精神品质，还原一个慈爱、温暖的人间鲁迅，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识形态虚构的鲁迅释放出来。而且，这本书的出版，以其真实、勇敢的回忆和敏锐的话题，激起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之后，父亲与我又整理出版一系列鲁迅有关著作，如《鲁迅家庭大相簿》《两地书原信》《鲁迅回忆录》原稿本、《鲁迅大全集》等等正本清源的鲁迅还原工作。

在出版还原鲁迅本来面貌的图书同时，父亲与我还开展了一系列鲁迅宣传、普及活动。如二〇〇六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在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举办“鲁迅是谁？”系列

图片展，以及相应的专题讲座；又如自二〇〇五年以来，逐年举办的“鲁迅论坛”活动；二〇〇九年以来每年一度的“鲁迅青年文学奖”评选等。

我以为，在这个时刻，父亲已经成长到第三个阶段了，他在为纷纭混乱的社会文化乱象担忧：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是二十世纪以来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方向的文化遗产，而如今，从商业上的无序、滥用、盗用，到中小学教育有意淡化鲁迅精神教育，再到儒家文化无限复苏、封建思想死灰复燃……这些都表现为鲁迅精神的丧失。他希望能通过重新梳理、弘扬鲁迅思想精神来推动文化的开拓创新、民族的复兴。为推动鲁迅研究走向一个更深更新的研究空间，二〇〇九年在同济大学成立了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海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开展《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和《鲁迅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的专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并在每年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学者探讨鲁迅思想传播问题。

在这些工作中，父亲受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不顾年迈，越做越起劲。父亲与我也相互鼓励，碰到困难会相互商量。在工作中，虽然他是我的领导，但是很民主，会听取我的意见、想法；在生活上他是我的父亲，他的言行举止让我感到他的执着、韧性与我的祖父很像。在家庭里父亲的凝聚力也非常强，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我的兄弟和妹妹的理解与支持。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认为不要自找麻烦，因为维权过程中也听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辱骂的声音。大家就觉得何必呢？尤其是我母亲，觉得父亲年纪大了，别再管这些事情了，也没什么好处啊。确实，我们所做的很多事跟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总要有人出头做这

些事情，作为鲁迅的家属，更应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在很多事情上要讲原则。他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都不去做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是没法一直往前发展的。也许这样说显得在讲大道理，但是父亲确实感受到肩头的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名人后代的责任感。现在有很多人都事不关己，不愿意受名人之累，只想过平淡的生活，这也可以，但是不要忘了身上的责任啊，既然继承了某某名人后代这样一个名号，应该切切实实做点传承的事情。就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即便在最后的的时间里，只要父亲能动，就一直在做还原鲁迅、弘扬鲁迅的事情。父亲和我都认为，如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各个领域的名人后代，都有传承革命的先进优良传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

如今，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已经成立十六年了，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依然困难重重，第一我们没有经费来源，第二家族成立的组织还是有很大的局限。父亲认为鲁迅的事情，我们家族要参与，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他希望能成立基金会，用基金会的力量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赞助，维护公益的文化事业，这也是这几年他和我商量思考过的必须要采取的途径。二〇一〇年五月份父亲有过一次病危，他写了一份求助书，求助大家一定要把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起来。后来他的病情慢慢好起来了，这封信也没有寄出。近一年时间里，他的病情反复了好几次，我一次次赶去北京，他把我赶回上海。他对我说，北京有子女可以照顾他，而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边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父亲一直记挂着今年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他觉得如果这一年的事情没有好好做的话，对纪念、延续鲁迅文化的传统会有很大

的影响，会成为一个断档。

我觉得父亲真的很不简单，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不像一般老人那样考虑的是如何安享晚年，考虑的是小家庭里的一些琐碎事。在二〇一一年的一月份，他就做了一个托付，和我谈了一天关于身后的安排，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好了，之后又稍作修改，他就签名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他是很干脆的。父亲最后的日子，主要关心的、谈论的始终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怎么办啊，进行得顺利不顺利啊，进度是否来不及啊。那时父亲只能带着呼吸机面罩听我汇报工作，表情非常痛苦。因为带着呼吸机，不方便讲完整的话，我就和父亲商定，由我来讲，他认同就点头，不认同就摇头，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我们经常是这样来沟通的。父亲当时的意识还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提到思想界的乱象，文化复辟的事情，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子像，他就一直在摇头。即便身体非常虚弱，父亲依然坚持颤抖着手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只关心鲁迅文化的弘扬，让我非常感动。

父亲生前还有三个心愿期待实现：一是出版首部一千五百万字三十六卷的《鲁迅大全集》，二是成立全国性的鲁迅文化基金会，三是把十年一遇的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办好，而且他认为这一年比往年尤为重要。我们都已帮他完成。几十年来，父亲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家里人也曾劝他知难而退，但是父亲坚持了下来。父亲认定了方向就义无反顾往前走的执着，是对我们后代的极大教育和鞭策。现在父亲不在了，但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奋斗。



## 目 录

- 01 有些性格像鲁迅 顾明远
- 05 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 周令飞
- 1 记忆中的父亲
- 35 大陆新村九号
- 49 阿花与许妈
- 55 父亲的死
- 82 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契
- 94 建人叔叔的不幸婚姻
- 110 朱安女士
- 119 “不卖血”的朋友
- 134 迁入霞飞坊
- 145 霞飞坊邻居
- 159 母亲的被捕
- 169 我家的房客
- 176 几位朋友
- 187 母亲娘家的亲戚
- 197 坚守上海